

20 世纪 80 年代报告文学生态意识研究

段朋飞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迅速转变, 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从和谐走向了对立。传统生态观的瓦解使生态意识走向边缘化, 引发了生态精神空间的扭曲、萎缩和变形; 而该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弱化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化的表现之一。生态整体观的启蒙, 既反映出生态意识的结构化, 又诠释了生态精神的重组与复归。因此, 对报告文学中的生态意识研究, 不仅有助于树立和谐的生态整体观, 亦有助于将生态意识边缘性回归到常态化。

关键词: 报告文学; 生态危机; 生态意识; 边缘化; 整体观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4-0082-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4.013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Reportage in the 1980s

DUAN Pengf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China 830017)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with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valu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evolved from harmony to confrontati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oncept has made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marginalized, triggering the distortion, contraction and de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piritual space. The weakening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reportage in the 1980s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overall concept of ecology not only reflects the structuring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interprets the reorganiz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ecological spiri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reportage not only helps to establish a harmonious overall view of ecology, but also helps to return the edg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o normalization.

Key words: reportage;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marginalization; holistic view

面对当前环境恶化的现实, 诗意的生活既是一种想象, 也是一种人类所持续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方式。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后发展国家避开他国的弯路, 也为了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较早地走向了环境治理的道路。然而, 中国却依旧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细察这种发展模式, 它多少与 20 世纪 80 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该年代报告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却令人焦虑, 发人警醒, 引人深思。进一步来说, 20 世

纪 80 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弱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环境保护的问题, 而环境保护的问题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还应当深入普通百姓之心。因此, 如何认识和变革人们的生态弱化意识, 不仅是当务之急, 也是本文研究的根源所在。

一、报告文学中理性滞后建构了生态危机

作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里的第一个音符,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报告文学以特殊的方式将生态理性的滞后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真实地反

收稿日期: 2017-09-05

作者简介: 段朋飞 (1990—), 男, 河南鹿邑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映了该年代人们生态意识边缘化的问题；同时，它又映射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引发人类对自然敬畏的深思。因此，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理性的滞后现象，其内涵表现如下：

第一，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裂变衍生出生态行为的错乱。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型期，大刀阔斧的变革举措致使我国传统生态价值观的逐步瓦解。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它逐渐建立起该年代人们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不仅加快着人对自然的掠夺的进程；而且也神化了人的主体意识，支配和控制自然的意识观扩展到了经济利益追逐的怪圈里，“个人中心主义”观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生态观；同时，它又强化了“人定胜天”的观念，弱化了传统的生态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中，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便是一部既充满沉痛感又见深度的典型之作。在文章结语处，他说道：“由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化，西部人民无以为生，于是国家便投资实施大规模的西部移民工程。”投资西部移民工程这一举措，深刻地揭示出这个地区的人们所面对的生存困境的艰巨性和生态精神的严重缺失。在麦天枢看来，西部的贫困不仅在于自然资源的贫瘠，也在于人们生态意识的薄弱。他用简单的话语平静地叙述着西部地区的生态变化，也表达着他对20世纪80年代人们生态意识荒芜化的失落之情。另外，他凭借着手中的笔书写着曾经的自然之态，不仅记录了该年代生态恶化的现实和趋势，而且也预示着生态危机频发的可能性，使得人们对自然生态恶化的现状有了更多的关注。

第二，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游离丰富了生态意识边缘性的内涵。细察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其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却脱离于传统的生态整体意识的范围，引发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远比传统生态模式作用下发生的事件多。例如，《伐木者，醒来！》便是典型的代表。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徐刚通过对新闻材料的剪切和政府统计的数据记录，从现实的角度说明了生态加剧恶化的情形，恶果以及人们生存的现状。这种生态危机现状较多地体现在洪区国有林场的滥砍、滥

伐、水土流失、民众的哄骗、政府的不制止、法律条文的空白等方面。另外，他对这些不文明的生态破坏行为发出了既愤懑又无奈的呐喊，较多地流露出他的无奈之情。

第三，20世纪80年代，现代工业文明的过多植入腐蚀了人们的传统生态观。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改革期，报告文学中生态观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在此种不稳的变革态势下，现代工业文明逐渐破坏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改变着生态常态化的发展。基于此现状，现代工业的强大植入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过度控制的结果。从理论上讲，经济的发展固然能够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它同时也变革着人们已建构起的生态观，促使着人们生态意识朝着荒芜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工业文明作用下的生态意识，偏离了传统生态观的正确导向，将人们卷入物质利益追求的漩涡中，从中来填补生态精神空间上的空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工业文明一直持续侵蚀着该年代人们传统的生态意识。

二、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危机的展现

在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作品中，报告文学家在小说与散文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例如：哲夫、陈应松等。虽说报告文学家创作的精品不多，也未能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但它们却是最佳的实例证明，对后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初期的报告文学，主要以纪实的形式反映着该年代的生态问题，其中以沙青和徐刚为典型代表；后期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专门的生态杂志，比如《大自然》，也诞生了以李青松为代表的专业生态报告文学工作者。这些工作者为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一步来说，20世纪80年代时期的中国处在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型，它引发着生态环境诸多方面的突变。尤其是一系列生态危机现象的陆续出现，引起报告文学家们的密切关注。报告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危机的展现，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人对生存环境恶化的焦虑投射到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的思考上。这种投射致使人类对自

身精神空间的忧虑,以及人们对生态破坏的深思。在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报告文学家通过列举生态恶化的现状,进一步说明环境污染对生态意识的侵蚀度之深,甚至导致生态意识的变异和发展。以此类题材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用触目惊心的数字记录着该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残酷现实。沙青在《北京失去平衡》这篇报告文学报道的对象是北京水资源的危机现实。文中写道:“生命之母,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岁,在北京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1]他通过实地采访,搜集和整理了北京水资源的相关数据,深刻揭示出北京地区缺水的真实原因;相应而言,这个鲜活的实例也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北京地区水资源恶化的严重事实。

其次,生态的持续破坏导致自然对人类进行多方面的惩罚,使得人类对诗意的栖居进行不断地追寻和构建。诗意的生活是人类生存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如荷尔德林所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之上。”^[2]然而,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急速转型,导致人们把精力过多地放在经济效益的追求上。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弱化,形成了自然生态观的断裂局面。一旦人的生态意识被物质欲占有,表现出来的生态行为便解构着人类自身生活着的诗意家园。因此,自然生态的持续破坏逐步演变为人类失去“灵性的家园”的现实,最终引发了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3]75-106}在《黄土地,黑土地》这篇报告文学中,马役军提出了人源于土地,而人的最终归宿也应该回归于土地里,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理念融合的体现,也是对复杂人性和精神危机的深思。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人们从对土地的盲目感恩,到今人对土地的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土地给予人类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反,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却感到巨大的恐惧和焦虑,其原因在于人们的生态精神空间的萎缩,进而造成20世纪80年代人们生态意识的边缘化。

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里,它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表达,亦即是报告文学家对生态意识危机的观照。这项工作大多由新闻工作者、生态作家徐刚、李青松、哲夫等人在进行努力的尝试。

他们对生态危机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也更进一步对建构起来的生态意识危机做出了新的认识。在该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人们的生态意识危机的实例处处得到体现,而形成的生态危机意识却一直深深地烙印在后代子孙的意识里。例如,徐刚在《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里指出:“在1927年7月湖北省爆发了五十年至一百年一遇的洪荒之灾,应城全城浸泡在水里,淹死近千人,许多县以及汉水下游均为重灾区。”又如:“区域性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水患,是对我们的一提醒:在长江流域之内,江物分长短,湖不论大小,都是长江的延伸,都有牵一发而动千钧之力。”^[4]生态危机的频繁出现,大多源自于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无论是满足工业发展带来的实际效益,还是西方思潮对传统生态意识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人类生态意识观彻底变革的态势。尽管有报告文学家不断的呼吁,但效果不佳。再如,哲夫的《黄河苦旅》中指出许多残酷的事实:近几年面对采金者和偷猎者的进入,他们以每年上万只的速率猎杀藏羚羊,已经由原来的几万只锐减到目前的万把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可可西里曾经有十万头野鹿,在短短的几年里,它们为了自己头上的鹿角已付出了灭种的代价。近年来,人们已很少看到野鹿出没。这些非法的生态破坏行为,反映了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愚昧与无知,以及人性的残忍。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作家还运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以此来说明青海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问题:“一株树上有三个果子”:一是草原严重退化;二是以每年200万亩(133 333.3 hm²)土地沙化;三是严重的水土流失。这三个重大问题令人心生寒意,巨大的数字既让人触目惊心,又指出人们“精神世界污染”的严重性。^{[3]14-242}我们不得不说,它所引起的生态意识的解构造成了生态意识危机,同时也加剧着20世纪80年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总而言之,面对该年代生态意识危机之态,我们有必要返回到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整体观,让人类真正理解和领悟到生态和谐的价值和意义。

三、人的革命意识孕育了生态意识边缘化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以生态问题

为主线的新闻工作者高度关注自然生态中的种种失衡问题，又采用大量的实录材料和实验数据，揭示出自然生态失衡的程度，人类生存范围缩小的事实，甚至它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家们记录的生态现状，不仅呈现出生态意识边缘化的事实，也透露出人的革命意识在生态意识形态领域内自我孕育、自我生成、自我发展，最终确立了“人定胜天”的生态意识观。虽然这种发展是微弱的，但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的无序发展和壮大，既加快了自然生态破坏的力度，也将生态精神的建立推向了深渊。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中，人的革命意识异化了生态整体观，其主要的方面，表现如下：

其一，面对自然资源的搁置，人的革命意识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只有不断地对金钱财富的持续占有和物欲的持续膨胀，人类才能满足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基于此现状，何建明很早就开始关注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他的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中，无形地透露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他以焦急心情报告着国家矿藏资源的情形，在许多地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横行，结果到处都是采矿的人流，祖国大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这是人类对自然过度征服的惨痛代价，也让人们失去保护生态和谐的践行之心。又如，在《血色黄昏》报告文学中，复原的军人不顾生态规律，大肆开发草原造成的草原沙漠化，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自然的惩罚面前，他们才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农垦工程”。再如，陈桂棣撰写的《淮河的告急》一文提及的事实也得到了历史性的展现。曾流传于淮河地区的民间歌谣，真实地反映了淮河污染的沉痛事实：“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这来自淮河的紧急报告，它向人们如实地报告着淮河的水是怎样被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者破坏和污染的，甚至严重造成了沿岸人们生活饮水、农用水困难、大量珍贵物种的灭绝和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加深着人类无力挽回和谐生态局面的失落感，而

人的生态意识边缘化便应运而生。这种生态意识的产生，大多根植于人们摆脱了传统的生态价值观的影响。相反，革命性的生态意识在逐步加强。

其二，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破坏离不开政治、经济政策的抉择和引导。社会秩序的开放，高扬了人的革命意识，却弱化了生态意识，引发了生态意识危机的出现。例如，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吴国盛先生评析唐锡阳的生态文学作品《草原对我说》时，他指出：“决策者的愚蠢首先表现在不理解生态优势的深刻意义，他们不懂得生态财富是至高无上的顶级财富。我们不经意丢失的被视为无用的东西，往往都是价值连城但永远也找不回来的瑰宝。需要首先对他们进行生态启蒙。当然，需要生态启蒙的不只是他们，而是我们整个时代。现代性通知下的近500年的世界历史，是一部生态智慧的遗忘史。”人们对生态优势的理解不足，抛弃了自然生态固有的财富，产生的生态灾难不断地发生，而其首要因素归因于决策者能否长远考量。

因此，人类的革命意识的过度泛滥，让生态整体观走向了解体的地步，这无疑对生态精神空间造成了严重的创伤。报告文学家对生态破坏的关注，既扩大了生态精神的空間，又揭露出报告文学中生态革命意识。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意识是首要的，它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度高扬，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人们固有自然观的变异，进而形成生态意识边缘化的局面。当报告文学家看到这一系列惨痛的现实时，他们的呼吁之声便转向了对人类生态和谐意识的唤醒上。因此，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边缘化的产生，大多是人的革命意识在文学中的集中反映，而全面认识20世纪80年代报告生态革命意识，需要历史与人文的对话，力求还原该年代人们的生态观的面貌。

四、生态意识边缘化产生的缘由

报告文学的宗旨是唤醒社会全民的生态意识，调整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终极价值在于人类的福祉和人类未来生存的前景。然而，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中，生态意识的边缘化偏离了其宗旨。其边缘化产生的

缘由,如下:

其一,人类的欲望持续膨胀助长了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人类物欲的膨胀阻碍了生态完整性的恢复,对这样的增长无极限模式而言,这种“增长癖文化”向自然敲响了警鸣钟。例如,梅多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里指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的活动越是接近于地球承受的这种活动的能力的限度,权衡取舍就越是明显和无法解决。”^[5]如果说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那么人类对生态资源的获取也会无限地增长下去。与此同时,麦金太尔也指出了:“人类欲望的多重性就必须用超的欲望的规则来控制和指导欲望:‘我们的哪种欲望须被成认为行为的合法指导……’那些能够使我们针对不同欲望要求作出抉择和安排的规则——其中包括道德规则——不可能从欲望中引出,也不可能参照这些欲望来合理论证,而规则必须裁决欲望。”^[6]

其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开放。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被经济利益所迷恋,经济优先发展的理念成为了当时的时尚和潮流。在此背景下,人们用生态价值来换取经济价值成为该年代人们生存的特点所在。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一文通过介绍武夷山树木被伐惨痛现状,展现出武夷山自然生态系统破坏的力度。例如,森林变成荒山、水土的流失、江河的泥沙淤积、航运受到极大的损失、瀑布景观的消失等。从这些破坏现状来看,生态意识边缘化便蕴含此中,这样的惨状让人们对于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理念有了深刻的认知。在伐木者走后,陈建霖望着自己买下的一棵棵树木,他哭了。他哭代表了什么?那是对自然家园的坚强守护,对人的野蛮性感到无奈和悲哀。他看着砍过的树木深思:“武夷山还经得起多少把斧子来砍?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在金钱和良心面前,就这样落落大方地选择了金钱践踏良心?这样的以破坏生态毁灭文化为手段的富裕,实质上是以子孙的贫穷为代价的。”^[7]人类通过毁灭自己的生存家园,以此来换取丰富的物质财富。文中的伐木者丢弃了人类诗意栖居的理念,而他却用巨额物质来肯定其自身的生存价值。从这篇报告文学来看,其背后隐藏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时期,伐木者所追求的经济

价值持续上升,诱发了人们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和对自然生态价值的忽视。

因此,生态意识边缘化的缘由,在于人类抛弃了传统的生态和谐观,反而过度地追求经济利益和物欲的无限膨胀。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人们对金钱财富的崇拜不断升温,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危机的持续发酵,引发了许多自然生态的破坏及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树立生态和谐意识,也是摆脱生态边缘化的首选方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审视人们生态意识边缘化,既是基于人性的反思,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五、生态意识边缘化孕育生态启蒙

20世纪80年代,自然生态的主题是人对生态意识启蒙的认可与接受。面对多元文化思潮的入侵,人类的精神家园从狭隘的空间转为开放的空间。精神空间的扩大,早已容纳进了生态边缘化意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生态整体观的土崩瓦解,既证实了生态意识边缘化的确立,也异化了当时人们的生态精神空间与心灵世界。

细察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所举的生态危机事实,无形地孕育着生态启蒙,亟需人们建立起生态整体观。20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多以“个人中心”出现,助长了人类宰割自然的疯狂举动。在徐刚的《最后的疆界》中,他提出人类在大陆遭到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同时,海洋也在经历着被人类污染的苦难,海洋的情况更是令人堪忧的。随着海洋的持续污染,人类的生存空间逐渐地缩小,影响着生态意识的细微变化。

又如,在徐刚的《中国风沙线》中,他列举西辽河中游的科尔沁沙地、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及河流沿岸。由于人类历史上的过度开垦,现在这些地区已变成一片片的荒漠。楼兰古国文明和罗布泊的消失,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引发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对西辽河地区资源的过度开采。对徐刚来说,他始终默默地关注着西辽河地区的生态发展动向,寻找着这一地区生态恢复发展的可能性。文中也提到了一句话:“人心散了,风沙就张狂起来了。”这句既简单又朴实的话语,透

露出人在自然界的存在法则面前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性。

因此，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生态意识边缘化启蒙了人性的复归以及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尊重。过度地征服自然并不能满足人类最原始的情结，人类不仅要融入自然之中，还要从自然的循环中找到合理的定位。例如，李青松在《告别伐木时代》一文提出生态自然化，指明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概念，在森林群体中包含着许多生物群体，它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他又借用德国林学家穆勒的话：“森林是个有机体，其严格的连续性是森林的自然本质。”^[8]李青松提出的生态系统论，亦即是生态整体论，也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的重新审视，更是基于人性的思考而产生的敬畏之情，从而将人的生态意识边缘化从禁锢于经济行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到和谐的自然常态中去。总之，生态整体观是人类精神生态空间的内在表现，也是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观的轨道上自由运行的结果，更是把游离于自然生态之外

的意识回归到自然生态常态化中去，以此来提高生态性灵化的自然之美，从而远离生态破坏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创伤。

[参考文献]

- [1] 吴晔. 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都市问题卷——北京失去平衡 [M]. 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
- [2] 荷尔德林. 人，诗意的栖居 [M]. 先刚，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 [3] 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4] 张锲，周明，徐刚. 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 [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676-685.
- [5] 梅多斯. 增长的极限 [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6] 麦金太尔. 德行之后 [M]. 龚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63.
- [7] 徐刚. 伐木者，醒来 [M]. 长春：吉林出版社，1997：7.
- [8] 张锲，周明，李青松. 告别伐木时代 [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745-747.

